

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 差异空间联动效应分析*

李豫新 程谢君

【摘要】文章在对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互动机理及空间格局演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探讨了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联动效应。结果显示,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二者空间关联也从相离走向相合;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逐渐扩大与迁移动力不足源于宗教文化与市场文化的难以调适,也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量不重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严重缺位、城乡二元结构稳固及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有关。政府不合理地干预市场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偏离地区比较优势的倾向,削弱了地区经济整体实力并扩大了区域差异;民族高度聚集区居民幸福感高涨是其“固守本土”的主要内因,而无上限的政府扶持则放大了民族地区人口的迁移惰性;城镇化进程的不合理使其在吸引剩余劳动力、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上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文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迁移 区域经济差异 空间联动效应 民族地区

【作者】李豫新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谢君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向纵深方向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量”与“质”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然而,长久以来,民族地区人口携带其附属资本不断向东部地区流动,造成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西部民族地区逐渐步入“要素失衡缺失陷阱”(康文峰、杨继瑞,2013);无独有偶,民族地区内部地理资本彼此相异、经济基础大相径庭、历史文化迥异,其内部经济差异也日益扩大。从具体数据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稳定—发展’双重目标下新疆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编号:15AGL023)的阶段性成果。

看^①,2015年东部发达地区人均GDP是民族八省区的4倍有余,而2000年这一差距尚不及2015年的一半。民族地区经济差异不仅表现在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比较上,更表现在民族地区内部。从省际看,2015年民族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内蒙古比最低的云南多4.3万元,是2000年的25倍多;从省内看,2015年新疆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玛依比最低的和田多14.4万元,而在2000年二者之间的差距仅为4.98万元。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特别是地区内部经济差异的逐渐扩大,桎梏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深度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长期以来,部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社会稳定,一直以来都是省内外人口迁移的主要指向地;而另一些少数民族高度聚集地(如南疆地区)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差别,人口流出动力不足,在人口适度迁入的背景下,俨然成为人口迁移的“堰塞湖”^②。

鉴于此,本文的聚焦点在于:人口迁移对经济差异的影响是助长效应大于抑制效应,还是相反?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空间联动?研究这些问题对判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的基本演变态势,进而理解民族地区经济与人口的时空关系,寻求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人口流动的具体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能够通过改变“分子”与“分母”的方式影响区域经济^③,最终实现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共赢局面(樊纲,1995)。事实上,人口迁移在促进劳动报酬均等化上可能卓有成效,但不一定能够促进人均产出与居民收入均等化(许召元、李善同,2008)。黄国华(2010)认为,劳动力流动在流入地的“乘数效应”与流出地的“扩散效应”之间存在明显的效率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的固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区域人均GDP的断层难以弥合;刘会政、王立娜(2016)的研究也表明人口流动能够缩小京津冀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但并未显著缩小人均GDP差距。余吉祥、沈坤荣(2013)基于经济集聚的视角研究人口跨省迁移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空间集聚的规模效应能够提高迁入地的人均收入,并由此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人均收入差距;如果进一步考虑劳动力的异质性,高人力资本与低人力资本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出现明显背离,即高技能劳动力的聚集能够有效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反之亦然(赵伟、李芬,2007)。

近年来,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演化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

① 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

② 2000和2010年南疆地区迁入人口分别占南疆总人口的7.4%和11%,而迁出人口仅占南疆的1.6%和7.5%。

③ 分子即地区GDP总量,分母即地区人口数。

颇为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马戎,2007;高志刚、刘伟,2016)。例如,高志刚、刘伟(2016)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样本,发现1994~2002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呈现先慢后快的基本态势。(2)民族地区人口与区域经济差异耦合度。张锦宗等(2012)认为新疆经济具有显著的民族差异,并且民族与经济分异的格局已经达到高度耦合的程度。(3)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王淑娟等(2015)通过对劳动力流动进行模拟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显著抑制了新疆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但这一效应在地区之间有所差别。

已有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有以下两方面不足:(1)鲜有学者在剖析“人口迁移谜题”与经济差异问题时能立足于空间尺度,并从两要素的联动性出发,考虑二者的空间联动效应,因此难以揭示区域经济差异及人口迁移问题的本质,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2)在西部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地位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多数研究并未给予民族地区充分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以民族地区为研究范围,以空间为研究尺度,在考虑到民族地区各要素具有相依性、人口迁移具有特殊性的情况下,结合相关调查,对西部民族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的互动机理及基本现状进行分析。

三、机制分析与现状描述

(一) 机制分析

1. 人口迁移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机制

在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结构依旧稳固且城乡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等发达地区的流动。一般而言,与多数地区一样,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城市等发达地区的拉力为主,因此劳动力就业角色转换成本、迁移成本相对较低,这也保障了劳动力流动不是一种地区间同质性的劳动力置换,而是一种职业“晋升”,因此这种劳动力迁移不是“盲流”。

虽然政府逐渐放开对市场经济的管制,但在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招商引资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是地区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经济,会使经济发展存在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并导致企业生存与竞争能力逐渐削弱、地区经济差异逐渐扩大的局面;户籍制度不断强化城乡二元结构使迁入者与本地居民相比获得了“歧视性的待遇”,迁入者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歧视性待遇可能造成农民工在对个人与子代的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资回报被扭曲,在宗教信仰差别较大的背景下,这种“扭曲”会在弱势群体的心中不断放大,进而对人力资本等的投资形成负激励,在迁出人口所附带的人力资本高于留守人口的情况下,这种“负激励”是造成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迁出地与迁入地在人力资本的较量中拉大地区差距的重要推手。

2. 区域经济差异影响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

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地区开放度的提升解放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思想,而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则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提供了可能。但对于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而言,这种迁移并非仅考虑收入等基本因素,更重要的是迁出者的宗教信仰能够得到认可,只有当迁出者收入及囊括宗教信仰在内的居民幸福感都能够达到甚至高于其所能接受的水平时,劳动力才会选择流动或者迁入该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要求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木拉提·黑尼亚提,2011),部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即使是在世居所在地存在足够推力的情况下,仍不会或者较少迁移,进而形成迁移惰性,而政府对民众过多的补贴也加重了这种人口迁移惰性,最终导致人口迁移率低而经济差异逐渐扩大的局面。

(二) 现状描述

本文首先以 2000 和 2010 年为观察年份,以新疆为研究样本,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与人口迁移概况进行时空两方面的论述。新疆地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与空间位移。具体而言,2000 年新疆地区经济差异集聚特征($Moran=0.5117$)较 2010 年($Moran=0.4413$)更为明显,其中 2000 年主要集中在南疆,且以南疆三地州表现为甚;2010 年则逐渐北移,集聚效应也相对下降,并且地区经济差异严重程度以乌鲁木齐市为轴心,逐渐向周边地区衰减。分区域看,2010 年新疆整体区域经济差距(3.32)比 2000 年(3.51)有所放缓,但北疆、东疆及南疆地区经济差距都有所扩大,南疆经济差异扩大最为明显,由 2000 年的 2.98 扩大到 2010 年的 3.38(见表 1)。

从空间维度看,2000 年新疆人口净迁移率呈现北高南低的基本空间格局,并且高值区多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周边;在此时间段内,东疆人口净迁移率最高(8.33‰),北疆次之(7.92‰),而南疆人口净迁移率(7.33‰)则低于新疆整体水平(7.65‰)。从迁出与迁入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看,2000 年新疆人口迁出动力总体不足(迁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 5%),而迁入人口多以北疆或东疆为目的地。从绝对数与相对数看,截至 2000 年南疆迁出人口为 12.35 万人,而迁入人口为 56.89 万人,是迁出人口的 4 倍多(北疆为 2.8 倍),在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绝对数与相对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南疆已然成为人口迁移的“堰塞湖”。结合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布看,新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相互背离,主要表现在南疆人口迁移率低而经济差距大,北疆与东疆则恰好相反。

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人口净迁移率重心明显南移,但高值聚集区仍在乌鲁木齐市附近。在此时间段内,乌鲁木齐、石河子和吐鲁番人口净迁入率有所上升,克拉玛依和南疆的巴州人口净迁移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北疆的昌吉州和阿勒泰地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和克州出现了人口净迁出(见表 1)。从迁出与迁入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的相

表 1 2000 和 2010 年新疆各地州主要经济差异及人口迁移变动情况

地 区	经济差异		人口净迁移率 (‰)		迁出人口占地区总人口 比重(%)		迁入人口占地区总人口 比重(%)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北疆								
乌鲁木齐	2.13	2.43	16.22	31.89	8.68	11.19	30.50	48.16
石河子	1.55	2.02	9.28	21.36	14.47	18.43	23.65	39.74
克拉玛依	2.66	3.58	21.96	21.37	3.02	12.21	37.85	32.10
博州	1.60	2.87	15.47	2.68	5.94	16.31	36.58	20.82
昌吉州	1.41	2.19	0.50	-0.44	11.90	26.40	37.37	25.02
伊犁	2.01	1.52	4.91	4.79	5.67	16.73	11.86	14.68
阿勒泰	2.14	1.44	2.37	-1.47	5.07	16.10	4.04	11.09
塔城地区	2.10	1.77	3.23	2.95	7.36	23.34	15.73	17.40
东疆								
哈密地区	2.35	2.55	17.57	6.96	8.91	19.35	41.75	26.25
吐鲁番	1.94	3.82	-0.03	6.61	2.18	10.35	42.75	17.14
南疆								
巴州	2.33	2.56	15.25	14.77	6.57	11.52	37.67	25.18
阿克苏	3.11	2.26	7.31	5.38	2.17	9.69	12.56	14.01
喀什地区	3.87	1.64	7.91	0.48	1.50	5.33	5.53	6.45
和田地区	4.94	1.38	2.60	-2.80	1.07	6.38	4.83	5.56
克州	3.56	1.63	3.53	-3.89	1.82	9.15	6.93	5.48

注：人口净迁移率相关数据来自新疆及各地州统计年鉴，迁出人口、迁入人口及各地州总人口数据来自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对数看，南疆人口迁出动力仍然不足，天山北坡经济带迁出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同时，南疆迁入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也比 2000 年有所下降；从绝对数看，2010 年南疆迁入与迁出人口数相当，迁入人口仅为迁出人口的 1.3 倍。结合 2010 年新疆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布可知，此时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存在一定的空间耦合，即人口迁移率越高经济差异越大。

四、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新疆地区经济差异与人口迁移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的联动效应，模型具体表达式为：

空间滞后模型(SLM): $Y = \rho WY + X\beta + \varepsilon, \varepsilon \sim N[0, \delta^2 I]$ (1)

空间误差模型(SEM): $Y = X\beta + \varepsilon, \varepsilon = \lambda E\varepsilon + \mu, \mu \sim N[0, \delta^2 I]$ (2)

式(1)和式(2)中, β 为参数向量, W 和 E 为空间矩阵。SLM中的 ρ 为空间效应系数,而SEM中的 λ 为邻近个体被解释变量对本个体的影响程度, ε 和 μ 为随机误差项。SLM与SEM的选择依据LM和Robust LM检验进行取舍。

对于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联动效应,本文拟使用地理加权模型(GWR)进行分析。具体模型表达式为: $Y=\rho WY+M+\varepsilon$ 。其中, Y 、 W 、 ε 、 β 与 ρ 意义与前述模型相同。 $M=[X'_1\beta(v_1),X'_2\beta(v_2),\cdots,X'_n\beta(v_n)]'$, v 为给定区域内的任何一个空间位置。

结合机理分析,文中两模型中共用自变量 X 包括:交通便利度、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率、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宗教文化、对口支援度。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模型还考虑人口迁移、地区稳定度、TCI指数(地区经济生产偏离比较优势程度);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影响模型自变量还包括人均实际资本占有量、居民幸福感、政府财政自给度。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新疆15个地州市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所使用数据来自新疆及各地州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疆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缺失数据通过各地州相应年份年鉴、统计公报补齐,如有数据冲突以统计年鉴为准。为有效减少变量的异方差,对大数值指标进行对数处理。为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具体变量设置为:区域经济差异用去除通货膨胀后的城乡收入差距表示。人口迁移率的计算公式为: $[t\text{年末人口}-(t-1)\text{年末人口}-t\text{年自然增长人口数}]\div t\text{年平均人口数}$ 。政府对民众的补贴强度用政府财政自给度表示,政府财政自给度越高,政府对民众补贴强度就相对较小,人口迁移率越大^①。为刻画宗教文化对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使用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表示宗教文化氛围;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使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段平忠,2013);对口支援度使用对口地域与接受支援地区GDP比值表示,并根据相关政府文献进行地域变化更新;居民幸福感在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水平等因素后使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测算(朱金鹤、王军香,2017)。地区经济生产偏离比较优势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TCI=(K_m\div L_m)\div(K\div L)$,其中, K_m 、 L_m 分别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从业人员数量, K 和 L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就业人数;基础设施水平的测算公式为:地州公路里程 \div 地州总面积;地区稳定性用各地州城镇失业率表示;人均实际资本占有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与地州总人口比重表示;城乡二元结构的测算公式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div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

^① 2010年,新疆财政自给度最高的是石河子市(76%),迁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4%;而财政自给度最低的是和田地区(10%),迁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6.04%。

五、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根据 Lm 和 R_{Lm} 检验结果,2005 和 2010 年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采用 SLM 模型进行估计,2000 和 2015 年采用 SEM 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随着 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各地州经济都得到了相对快速发展。战略实施初始阶段,内地支援与本地经济发展惯性更偏重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北疆和城镇地区,人口也相应向这些地区流动;而部分南疆和农村地区所享受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红利较少,主要扮演着人口流出地的角色,这部分流出人口由于技能低、思想观念落后,甚至身份不被认同,在流入地并未得到平等待遇,随人口转回迁出地的资本也相应较少。在迁出人口相对较少且迁出人口各种收入大多在迁入地被消化掉的情况下,即使其剩余收入能够在无成本条件下回归迁出地,但对迁出地经济生产的贡献也微乎其微。因此,在新疆省际与省内人口迁移过程中,地区经济差异逐步扩大,并以南疆为甚。2005 年前后,南疆等相对落后地区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Moran=0.946)和外省对口支援下,经济得到缓慢且相对平衡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南疆及全疆经济差异总体有所缩小,但南北疆经济差异仍然悬殊。2005~2010 年,部分企业撤离新疆^①,就业岗位的缺失及局势动荡引致人口流出^②,社会财富创造延缓,最终导致这一时期新疆整体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在经济基础本来就较薄弱的情况下,资本再次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而非扩散效

表 2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 量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常数项	0.433(0.648)	4.341*** (0.000)	-1.255*** (0.000)	-4.604*** (0.000)
人口迁移率	0.211** (0.021)	-0.149*** (0.000)	1.367(0.607)	0.014*** (0.000)
基础设施水平	-0.571*** (0.000)	-0.607*** (0.000)	0.203* (0.076)	-0.329*** (0.000)
城乡二元结构	-1.076*** (0.000)	1.266*** (0.000)	0.256(0.339)	-1.078*** (0.000)
地区稳定性	2.045*** (0.000)	0.870*** (0.000)	0.316*** (0.000)	1.345*** (0.000)
城镇化率	-0.222*** (0.007)	-0.074** (0.016)	-0.122* (0.054)	0.099*** (0.000)
TCI 指数	0.526* (0.059)	0.096*** (0.000)	-0.061*** (0.000)	0.0323** (0.016)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1.406*** (0.000)	0.809*** (0.000)	1.585** (0.001)	1.464*** (0.000)
宗教文化氛围	1.009*** (0.001)	0.361** (0.036)	0.288* (0.085)	0.313*** (0.005)
对口支持度	-0.028(0.730)	0.257*** (0.000)	0.218*** (0.002)	0.314*** (0.005)
空间系数	0.999** (0.012)	0.946*** (0.000)	0.578** (0.050)	0.849*** (0.000)

注:括号内数据为 p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① 2000~2005 年和 2005~2010 年新疆小型工业企业数量增长呈先增长后减少的趋势。

② 2010 年新疆迁入人口比 2000 年增加了 26.9%,而迁出人口比 2000 年增加了近 1 倍。

应,区域经济差异再次扩大。对南疆地区而言,对口支援的强制性抑制了对口企业的“市场化”选择,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南疆“经济韧性”,这一阶段南疆经济差异小于北疆。2015年前后,中央改变新疆发展维稳策略,地区安全局势有所缓解,地区性机场、高速公路的兴建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便利,政府鼓励内地企业雇用当地少数民族工人,因此人口流入与流出趋于均衡,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群体的流入与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劳动力的置换更新了新疆经济发展的血液,经济有所回暖,地区经济差异也逐渐缩小。

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经济差异多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基础设施较差是新疆整体经济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和2010年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差异影响显著为正,长期以来新疆各地州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投资相对更大,而扮演人口迁出地的乡村地区经济体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人民与社会发展诉求难以得到回应,在与城镇地区经济发展的博弈过程中长期处于劣势,地区差异也由此显现;2015年城乡二元结构对区域经济影响为负,说明近年来政府在破除体制障碍等方面成效初显,生产资料相对自由流动带动了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社会稳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大多显著为正,说明新疆社会不稳定给生产生活带来隐患的同时,也是地区之间与地州内部经济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城镇化率的系数由负变正,说明近年来新疆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存在两大问题:(1)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不匹配。政府对城镇地区的投资过大,而忽略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2)可能存在伪城镇化现象。即部分农民在城镇就业岗位并无空缺、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被强行“城镇化”,成为失地又失业的城市农民,而农村扮演的“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角色也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村与城镇之间、城镇内部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同时也说明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规模收益递减效应,因此试图通过传统城镇化路径发展经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并不现实。

其他变量中,TCI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疆大部分地区实施的工业赶超策略扩大了地区经济差异。长期以来,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都存在一定赶超性,在短期内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但由于各地州优势产业定位不准,从长期看会造成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偏离各自的比较优势,呈现优势产业发展愈发落后,而非优势产业发展愈发畸形的局面;同时,主导产业选择单一、盲目,使地州之间的恶性竞争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新疆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宗教文化对经济差异影响均显著为正。以南疆为例,南疆地区原生态的宗教文化与市场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固守原生态文化的居民市场竞争明显意识不足,在生产分配过程中长期处于末端,收入水平低;而宗教文化与市场文化的难以调适,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民族聚集区与市场集中区的“实际空间距离”,在分配格局既定的情况下,“实际空间距离”的延长扩大了民族地区与高市场化区域的经济差距。对口支援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差异。对口支援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经济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新疆对口支援仅停留在“能看得见”的地方,未能从提高地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提高地区实际经济实力;同时对口支援工作存在的诸多困境也严重削弱了其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

模型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地区的经济差异扩大也会引致地区经济差异扩大,这意味着新疆各地州之间及内部经济差异会受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乃至思想观念,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外在因素的冲击下,资源禀赋较好、经济结构合理且居民思想观念较为开放的地区会优先获得较快发展,并且通过一定“溢出”机制影响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 区域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2010 和 2015 年区域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影响采用 SEM 模型进行估计,而 2000 和 2005 年则采用 SLM 模型进行估计(见表 3)。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多不显著,说明对新疆而言,区域经济差异并不一定是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并未有效促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可能与新疆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新疆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农民每年能从中获得较高的收入,虽然在城镇从事工商业所得可能更高,但由于地区之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使劳动力迁移成本较高,因此虽然城镇地区形成了足够的拉力,但是农村地区的推力不足,最终导致劳动力迁移偏好较弱。而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而言,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风俗习惯、语言等存在天壤之别,因此即使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存在巨大推力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迁移量仍然很低。

基础设施水平对人口迁移率有正向影响,说明随着新疆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的不断完善,人口流动成本大大降低,人口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迁移目的地选择更多,人口

表 3 区域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 量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常数项	-0.212*** (0.000)	-4.588*** (0.000)	0.931 (0.000)	-17.206** (0.012)
经济差异	0.946 (0.216)	-0.836*** (0.000)	-0.013 (0.204)	0.349 (0.555)
人均实际资本占有量	0.081*** (0.000)	-0.898*** (0.000)	0.087*** (0.000)	-0.828*** (0.005)
基础设施水平	0.054*** (0.000)	0.136 (0.631)	0.053*** (0.000)	0.572*** (0.002)
城镇化率	-0.025*** (0.000)	-0.575*** (0.000)	-0.009*** (0.000)	0.265** (0.039)
居民幸福感	-0.241*** (0.000)	2.508*** (0.000)	-0.267 (0.115)	-3.1940*** (0.000)
城乡二元结构	0.137*** (0.000)	4.579*** (0.000)	0.256*** (0.003)	2.987*** (0.000)
对口支持度	0.534*** (0.000)	1.550*** (0.000)	-0.015*** (0.000)	-1.946*** (0.000)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0.045*** (0.000)	5.975*** (0.000)	0.110*** (0.000)	1.381** (0.032)
政府财政自给度	-0.064** (0.013)	-0.3112*** (0.000)	1.178*** (0.007)	-3.094 (0.526)
宗教文化氛围	-0.035*** (0.000)	-6.661*** (0.000)	-0.220*** (0.000)	-3.456*** (0.000)
空间系数	0.975*** (0.000)	0.307*** (0.000)	0.967*** (0.000)	0.986*** (0.000)

注:同表 2。

迁移量也有所增加。而城镇化率对人口迁移率的影响有所变化,说明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规模效应递减态势的背景下,城镇化难以继续助力新疆人口流动,在缩小区域经济上表现越来越差。城乡二元结构对人口迁移有正向影响,但并不表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利于人口迁移,相反这是近些年来政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工作的表现。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逐渐瓦解,提高人口迁移自由度,人口迁移量也相应增加,区域经济差异渐趋缩小。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够显著提高人口迁移率。这与现有研究结论类似(黄志岭,2014),高人力资本的个体会倾向于迁入经济发达地区,追求更高的工作待遇及更好的生活、实现个人价值。

宗教文化对人口迁移有显著负向影响。新疆作为宗教文化富集地,地区文化差别严重阻碍了人口迁移。具体表现为异地迁移会使少数民族人口远离世居所在地,而传统封闭的文化环境特别是语言不通等因素使少数民族迁移人口难以适应新环境,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迁移。居民幸福感与人口迁移率显著负相关。总体而言新疆少数民族聚集区居民幸福感并不一定比汉族聚集区低,这就形成了民族人口迁移动力不足的另一层面原因。调研发现,南疆喀什、阿克苏等地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民收入整体偏低,然而即使是在政府补贴交通费用、工资尚可的条件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少数民族居民仍不会积极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之中,更不用说长途迁移。

(三)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空间联动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刻画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的空间联动效应,本文选取 2015 年新疆 15 个地州市为研究样本,通过 GWR 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限于篇幅,在以经济差异为因变量时,仅列出人口迁移等 4 个因变量的分析结果,而以人口迁移为因变量时,仅列出经济差异等 4 个因变量的分析结果。

从表 4 可知,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在 2005 年则均为负。说明对民族地区而言,通过人口迁移缩小区域经济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迁移未能有效而稳定地发挥其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从区域内部看,民族人口高度聚集区的南疆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助长效应均比北疆、东疆大。南疆原居住地居民“固守本土”使其未能接受到相对现代化的新观念、新技能,而迁入人口多以承包土地等投资为主,且其投资所得多通过各种方式转回迁出地,对促进迁入地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南疆对口支援力度、地区稳定性及宗教文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均高于其他地区。对南疆喀什调研发现,对口支援显著提升了喀什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然而,对口支援工作在喀什仍然遇到了诸多问题。例如,深圳援建的喀什工业园处于“有厂无投资,有投资无人”的尴尬局面,某省援建的写字楼从用料到用工均不从本地获取,而是从内地调度,这种“只见建筑不见人”的对口援建难以增强地区经济整体竞争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更难以缩小地区经济差异。对

表4 2015年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差异空间联动效应的GWR估计结果

地 区	因变量:经济差异				因变量:人口迁移率			
	人口迁移率	对口支援度	地区稳定性	宗教文化	经济差异	对口支援度	宗教文化	居民幸福感
北疆								
乌鲁木齐	0.0157***	0.1404**	0.6781***	1.1452***	1.0764	-0.8864**	-1.1452*	2.7408***
克拉玛依	0.0162***	0.1598**	0.7532***	1.2436***	1.0764	-0.8767**	-1.2436*	2.4667***
石河子	0.0163***	0.1566*	0.7419***	1.2228***	1.0764	-0.8046**	-1.2228*	2.1682**
昌吉	0.0157***	0.1425**	0.6856***	1.1554***	1.0764	-0.8928**	-1.1554*	2.7409***
伊犁	0.0184***	0.2216**	0.9840***	1.5095***	1.0763	-0.3102**	-1.5095*	-7.6840***
阿勒泰	0.0134***	0.1100**	0.5321***	0.9912***	1.0764	-1.4498**	-0.9912*	5.5686***
博州	0.0177***	0.2004**	0.9096***	1.4270***	1.0763	-0.5285**	-1.4270*	4.6768**
塔城地区	0.0166***	0.1722***	0.8033**	1.3112***	1.0763	-0.8622**	-1.3112*	2.2915***
东疆								
吐鲁番	0.0153***	0.1300**	0.6395*	1.0965*	1.0764	-0.8934**	-1.0965*	2.9268***
哈密地区	0.0132***	0.0908***	0.4802*	0.9134*	1.0765	-1.1502**	-0.9134*	4.6998***
南疆								
克州	0.0200***	0.3483***	1.3720*	1.9546*	1.0762	0.7712***	-1.9546***	-7.1929***
喀什地区	0.0198***	0.2953*	1.2148*	1.7572***	1.0763	0.4573***	-1.7572**	-5.2637***
阿克苏	0.0195***	0.2662**	1.1275*	1.6630***	1.0763	0.1689***	-1.6630**	-3.5435***
和田地区	0.0200***	0.3143**	1.2675*	1.8042***	1.0763	0.7198***	-1.8042**	-6.8238***
巴州	0.0174***	0.1774**	0.8253*	1.3068***	1.0764	-0.4682***	-1.3068**	3.6811***

注:同表2。

口支援对新疆经济差异的正向作用由北向南逐渐递增,说明对口支援对新疆经济差异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地区不稳定日益严重使多数投资者对南疆望而却步,投资不足造成就业岗位不足,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不足,最终抑制政府、居民等对其他方面的投资,以此为起点,循环往复,使南疆落后地区更趋落后,地区经济差异难以弥合。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难以与市场文化相融合,是南疆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差异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从文化层面看,宗教文化的封闭性与市场文化的开放性存在众多难以调和的矛盾,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对市场文化存在一定的天然排斥,市场化意识的集体缺失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参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对口支援等外力的积极作用被宗教文化天然的消极作用所掩盖。

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对新疆各地州而言,经济差异并非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宗教文化对人口迁移均存在抑制效应且南疆表现得更为突出。新疆少数民族比重高、宗教文化气氛浓厚,在宗教文化熏陶下,占人口多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其他地域差别较大的风俗习惯,使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新环境时处处碰壁,产生迁移挫败感,语言不通更加重了这种挫败感,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向外迁徙;文化包容性弱、闭塞

的族内通婚等因素也限制了少数民族感知其他民族文化的途径,文化市场性元素严重残缺,传统教育模式的固有弊端并未有效地向传统文化中植入市场因素,影响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数量。对口支援对北疆和东疆人口迁移存在抑制作用,助长了南疆地区人口迁移,因此从总体看,对口支援对新疆人口迁移存在负向影响。东疆及北疆居民幸福感对人口迁移有正向影响,而南疆则相反。从具体数据看,南疆地区居民幸福感并不一定低于北疆、东疆地区,喀什甚至高于北疆部分地区。实地访谈结果表明,南疆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的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其迁移惰性,限制人口迁移;而北疆、东疆虽然居民幸福感得分较高,但在市场化因素的催动下,劳动力仍然会选择迁移以获得更高收入、实现人生价值。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差异在集聚中位移,二者空间关联在背离中走向耦合;宗教文化与市场文化的矛盾与居民的幸福感的阻碍了民族地区人口迁移的步伐,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只见建筑不见人”的对口支援虽能有效促动民族人口高度聚集区人口迁移,但对民族地区整体效果甚微,经济差异与对口支援的困境相伴而生;城镇化吸引人口迁移、缩小经济差异的效果随时间推移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特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空间缺位、城乡二元结构的广泛存在抑制了人口自由迁移,政府对居民无上限的转移支付助长了部分民族地区的人口迁移惰性,经济差异在政府不合理干预市场经济中逐渐凸显;在各种因素的扰动下,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抑制作用及经济差异对人口迁移的促进效应难以稳定而有效发挥。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民族地区经济差异彼此悬殊而人口迁移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改善民族地区传统教育模式,开阔新生代思维,加强民族地区人口对市场文化的接受能力。具体包括:传授诸如简易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带有颠覆性思维的课程;提高民族地区学校网络硬件设施水平,增加新生代接受新事物的渠道;大力兴建地区图书馆,增加民族人口接触“知识”的机会。(2)兴建动车、高铁,缩小民族落后地区与发达市场间的实际空间距离。在“成本—收益”评估下,固然在民族地区修建动车、高铁并非明智之举,但从短期看“要致富、先修路”,交通便捷是民众富裕的根本、自由流动的基础保障;从长期看,兴修高速铁路的“复利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3)设定政府转移支付上限,完善精准扶贫机制。犹如“慈善”的转移支付无法及时得到反馈,而给予上限则会“倒逼”转移支付获得者通过其余方式扩充自身财富。例如,部分地区的生育补贴应以10年或更短时间为限,而在补贴过时限后如接受者违背初始条约应给予罚款,这样就会促使获得补贴的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增加个人收入、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4)政府应有所为,更应有所不为。政府应该将主体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市场会自动选择比较优势产业进行发展。而对口支援应以提高地区企业生存及竞争力为宗旨,支援应更重质量而非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缩小新疆经济差异尤其是居民收入差异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底层人民的收入,这就要求政府应该在扶贫攻坚上有所作为、有所创新,通过官员脱贫责任制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最重要的是要革新贫困居民意识,通过加速人口流动等方式提高生产与人口分布的结合度;同时,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与人口迁移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点一面”结合的方式促进人口迁移、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参考文献:

1. 段平忠(2013):《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2. 高志刚、刘伟(2016):《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以新疆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3. 黄志岭(2014):《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4. 黄国华(2010):《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5. 康文峰、杨继瑞(2013):《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要素失衡缺失陷阱”的破解路径》,《区域经济评论》,第6期。
6. 刘会政、王立娜(2016):《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2期。
7. 木拉提·黑尼亚提(2011):《启蒙精神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新疆社会科学》,第4期。
8. 马戎(2007):《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9. 许召元、李善同(2006):《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经济研究》,第7期。
10. 余吉祥、沈坤荣(2013):《跨省迁移、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科学》,第2期。
11. 王淑娟等(2015):《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人口与经济》,第1期。
12. 张锦宗等(2012):《新疆民族人口与区域经济分异研究》,《经济地理》,第8期。
13. 赵伟、李芬(2007):《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14. 朱金鹤、王军香(2017):《共享发展视角下新疆居民幸福指数测评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2期。

(责任编辑:李玉柱)